

报刊的四种理论

〔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

新华出版社

报刊的四种理论

〔美〕威尔伯·斯拉姆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



新华

书店

报刊的四种理论

[美] 韦尔伯·斯拉姆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3,000字

1980年11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03·004 定价: 0.50元

译 者 的 话

我们研究新闻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新闻观点和总结当代新闻事业（首先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丰富的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这本《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一本代表作。这本书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影。另一方面对斯大林领导时期的社会主义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影进行了攻击。本书竭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论”。这一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极为流行。它要求新闻事业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要“为政治制度服务”，“为经济制度服务”，而对流行很久的“新闻自由”理论却不那么强调了。报刊的“社会责任论”之所以兴起，是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垄断资本集团企图加强对国家干预，以减弱难以解脱的危机。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尤其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更加需要

加强控制。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了，“社会责任论”于是应运而生。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五六年，是美国教会全国委员会为研究公众通讯工具的社会责任而写的四篇文章的汇编。出版之后，得到美国领导集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

二十多年来，这本书一直受到美国新闻学界的推崇，认为是阐述“社会责任论”的权威性著作。由于它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和任务较有研究价值，我们曾于一九六〇年译出供内部参考。现在又重新校订出版，供新闻界参考。

我们译文水平不高，一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一九八〇年一月

目 录

绪论.....	(1)
一、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8)
二、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44)
三、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84)
四、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125)

绪 论

本书所用“报刊”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而言；不过，我们谈出版物要比谈广播和电影多些，因为出版物出现的年代比较早，而且我们有较多的关于出版物的公众通讯的理论和哲学。

简单说来，本书要谈的问题是：为什么报刊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报刊的形式又有着极大差别？例如，为什么苏联的报刊不同于我们的报刊，而阿根廷的报刊又与英国的报刊不同呢？

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资助它的报刊的能力，能够投入公众通讯中的技术水平与财力物力，以及使报刊的流通更容易、更需要的都市化的相对程度；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报刊的差异，只是反映人们在不同地方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经验引导他们要读什么样的报纸。

但是，“这些差异还有一个更基本和更重要的原因。本书的论点是，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

的方式)我们相信,了解社会的这些方面,是系统地了解报刊的基础。”

我们要想全面地了解各种报刊体系中间的差异,必须考察报刊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但要知道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真正关系,我们还得注意社会所固有的某些基本信念和假设:人的本质、社会和国家的性质、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和真理的本质。因此,最后的分析表明,报刊体系间的差异,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异。本书就是要研究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

自从公众通讯工具出现以后,在文艺复兴时代,只有两种报刊的基本理论,或者说有四种,这要看我们怎样估计它们。我们已经写了四篇文章论述它们,并且力图说清楚后两种理论只是前两种理论的发展或修正。其中苏联共产主义的理论乃是较老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理论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但由于苏联人创造了一些与旧集权主义理论极不相同的东西,而且是今天世界上极重要的东西;又因为社会责任理论的道路是我们自己的报刊现在所采取的明显的发展方向,我们想最好把这四种理论加以分别论述,但同时又要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几种理论里,集权主义理论是最老的一种。它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不久的文艺复兴后期的集权主义气候下的产物。在那个社会里,认为真理不是人民大众的创造,而是几个处在指导地位上领导别人的聪明人的产物。因此有人认为真理是聚集在权力中心的近旁的东西。报刊的作用是从上而

下的。当时的统治者用报刊把他们认为人民所应当知道的事情和他们坚认人民应当支持的政策报道给人民。英国都铎王朝和司徒王朝认为报刊是属于王室的，因此必须支持皇室的政策。私人只有经过特许才能取得报刊的所有权，而这一特许状在任何时期，当支持皇室政策这一义务如果被认为没有履行，可以随时被撤销。因此，出版是权力机关与出版人中间的一种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前者颁给后者以独占权，而后者则给予前者以支持。但权力机关保留制订政策和改变政策的权力，颁发许可证的权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检查新闻的权力。显然，关于报刊的这种概念，和我们今天认为报刊的一种最普通的功能，即监督政府的责任，是不相容的。

报刊是国家的公仆，任何时候它的主要内容都要对当权者负责，这一理论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是受到公认的。从这一概念出发，建立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报刊制度的原始类型，而且今天仍然存在。正如以下的章节将阐明的那样，尽管别种理论已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被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所接受，而集权主义理论的实践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见之于世界各地。但政治民主与宗教自由的增长，自由贸易与旅行的扩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被接受，以及启蒙运动中的总的哲学气氛，破坏了集权主义理论，引起一种报刊的新概念。这种新理论发端于十七世纪末期，实际成立于十八世纪，盛行于十九世纪，那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把集权主义理论中人与国家的关系颠倒过

来。人不再被看做是受别人主宰的附属品，而是能够在面对着矛盾的事实或有所抉择的时候，分辨真伪、好坏的有理性的动物。真理不再被认为是权力的财产。相反，寻求真理的权力成为人类不能让与的天赋权力之一。报刊在这种情况下中的地位如何呢？报刊被视为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伙伴。

“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在这一基础上，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他们对政策的主张。因此，重要的是报刊必须不受政府的控制 and 影响。为了让真理生存，必须倾听各种见解。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无论少数或多数，弱者或强者，都能接触到报刊。这就是写入我们的人权法案中的报刊理论。”

两百年来，美国和英国的报刊就是这样的报刊，差不多完全不受政府的影响，并鼓励报刊在统治的过程中成为“第四等级”。如上所述，许多非共产主义国家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承认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在我们这一世纪中，已经有改变的潮流。在共产主义国家里，这些潮流已经成为新形式的集权主义；在非共产主义国家里，这些潮流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趋势。我们把后者叫做社会责任理论，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称。

在赫金斯委员会（即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译者注）的报告中，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广泛的宣传，但报刊编辑和发行人本身对这种认识反映得更早。这些人认为二十世纪的情况对于公众通讯工具提出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责任的

要求，这一事实是当人民开始衡量和评价他们所经历的“通讯革命”的时候才有的。

约在三十年以前，走进出版界或者办一家报纸或电台，就已经不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这些事业单位逐渐扩大，创办这种事业或经营这种事业，都需要巨量的金钱。许多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从中可加以选择的、各式各样的小报刊，不再成为典型的形式了。现在美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七的出版日报的城市，日报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三家电视台、四家无线电广播网、三家通讯社，为美国家庭提供了大部分新闻报道。换句话说，正象过去集权主义时代一样，报刊已落在少数有势力的人的手里。不错，这些报刊的新的统治者大部分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事实上，他们大力保护着报刊反对政府的权利。但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本身，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新的令人不安的权力。报刊不再象米尔和杰弗逊所论述的那样容易成为思想的自由市场。正如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说的：“现在，仅仅反对政府的干涉，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要说什么就有机会去说。报刊的老板和经理决定着哪些人哪些事以及这些事实的哪一种说法可以向大众公开”。这种忧虑就是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基础，报刊的权力和几近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大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断。如果报刊没有担负起这种责任，必须有别的公众机关来执行。

让我再讲一次，不要把社会责任理论看做是由组成赫金

斯委员会的一群学者创造出来的一种抽象的东西。新闻界有些人是这样对待这个理论的，对他们来说，赫金斯委员会是不受欢迎的。但在赫金斯委员会以前很久的时候，一些负责的编辑和发行人就表达过这个理论的要点，从那时以后，别的负责编辑也曾经提过，他们与赫金斯委员会并没有关系。这是一种趋势，不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

当自由主义理论正在对付自身的问题，并决定着它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就遇到了新发展起来的集权主义的戏剧性的挑战，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报刊理论。苏联报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并根据严酷的政治需要，来维持一个政党的政治权势，而这个政党所代表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十分之一。苏联报刊正如旧的集权主义报刊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苏联报刊与旧类型不同的是前者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的自由概念。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报刊受到这样严密的控制。而苏联发言人却认为他们的报刊是自由的，因为它可以按照党对于真理的看法去自由地谈论那个“真理”。苏联人说，美国报刊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它是受控制的事业，不能自由的去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两种报刊在基本论点上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尽管两方面都用自由和责任这类字眼来描述他们的作为。“我们的报刊想在寻求真理上有所贡献；苏联报刊想传达预定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理。我们把我们的报刊读者看成是‘有理智的人’，能够分辨真伪；而苏联

报刊把他们的读者看成是须受监护人细心指导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国家建立最完备的和可能的防范制度，来抵制消息上的竞争。我们偏向于保证新闻和思想有竞争，而他们偏向于保证既定方针通过苏联的报刊表达出来。他们说他们的报刊不自由，他们说我们的报刊不负责任。”

这四种理论决定了西方世界报刊的形式。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密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专政。以下，我们将一一加以论述。以下四章，每章都只是作者个人的论述、风格和意见，其中有些有待商榷的论点，我们并不想把它们说成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尽管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报纸中和我们的结尾中已经讨论过。

我们按时间次序，首先论述集权主义理论。

一、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弗雷德·赛伯特

在报刊与社会关系或与政府关系的四种理论中，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有普遍性的。当社会和技术充分发展到足以产生我们今天叫作公众通讯工具的时候，这一理论就为许多国家所自动采纳了。在许多现代社会里，它奠定了报刊制度的基础。就是不采纳这个理论的地方，它仍然继续影响一些在理论上信守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府的实际行动。

当印刷术在西方世界传播约二百年后，集权主义理论提供了决定大众报刊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英国都铎王朝，法国波旁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事实上整个西欧，都用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报刊控制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应用，并不以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为限，在其后的世纪里，这一理论仍然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理论，现代许多不同的国家如日本、帝俄、德国、西班牙和许多亚洲的以及南美的政府，都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采纳了这一理论。人们可以大胆的断言，集权主义的理论比任何

其他的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

一切人类社会似乎都具有一种发展管理社会的制度的本能。依靠这个管理社会的制度，可以调整个人之间的关系、机关之间的关系，可以满足共同的利益与愿望。（象谢泼德所说的，“这种制度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从社会权利的共同认识中直接产生的管理社会的制度，它自动的起作用，并且通过社会压力来执行。第二类是采取确定的组织形式的管理社会的制度，它通过法律命令来实施，并可以用特别刑罚来强制执行。第二类管理社会的形式，就是指广义的政府而言。”）^①我们将要讨论的管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就是造成了谢泼德所说的第二类管理社会的制度的一套原则。按照这个理论，报刊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功能和活动，是受着有组织的社会通过另外的机构（政府）所控制的。

基本的假设

（报刊与其他公众通讯工具的形式一样，既然发生在一个已经有高度的组织的社会里，报刊与那个社会的关系自然要受到当时管理社会的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所决定。）因为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集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

关于公众通讯工具与其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① 谢泼德著：《政府。历史与理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7卷第8页。

的任何理论，是被人与国家关系的某些哲学原则（也可以叫作结论）所决定的。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假设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人的性质；②社会与国家的性质；③人对国家的关系；④基本哲学问题，知识与真理的性质。

有组织社会的功能和目的的集权主义理论，接受了某些假设。（首先是，人类只有在作为社会一员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在力量。作为个人，他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但作为社会或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员，他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就无限地增加了。在这个设想下，团体比个人重要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团体，个人才能完成他的目的。）

（这个学说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这样一个命题，那就是集体组织最高形式的表现，即国家，在价值的尺度上，代替了个人，因为没有国家，个人就无从发挥一个文明人的特质。个人必须依靠国家，以实现进一步的文明，这是一切集权主义制度的共同要素。在国家里和通过国家，人类才能实现他的目的；没有国家，人类只能处在原始状态。）

因此国家是人类的充分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一假设产生了有关国家性质的一些基本结论。国家除了个人成员之外，又是一切应有的特性的综合。（国家有权决定它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它的权力是通过一种还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的过程推论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是神的引导，有时是依靠高度的智慧或领导的品质，有时是由于对于其他任何过程都缺乏信心。）

对于知识的性质和真理的性质，这些根本的哲学问题，

集权主义论者也有同样明确的答案。知识可以通过智慧来发现。人们利用智慧的能力和发挥智慧的努力，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既然存在这种差别，在社会结构中，就应该加以承认。“聪明人”能分析又能综合，应当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成为领袖，或者至少成为领袖的顾问。知识不是天赐的，而是由人为的努力得来的，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国家很好地加以引导，来为所有的人服务。这样获得的或发展起来的知识，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准则，并且带有一种绝对性的气氛，这种气氛使变动成为不受欢迎的，使稳定和持续性本身成为一种美德。此外，集权主义理论要求智力活动的统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统一，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集权主义派的理想主义者假定，这种统一可以从实现个人对于社会整体的贡献得来，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统一总是要通过经常的监督和控制才能达到。

柏拉图的集权主义理论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政府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几位代表者。柏拉图把贵族政体理想化了。他认为，人的本性（包括他的物质利益和私欲）会使政府从贵族政体降低为富阀政体，降低为寡头政体，降低为民主政体，最后降低为暴君政体。他认为国家只有掌握在聪明的执政者手中才安全，这些人受道德权力的控制，而又用这种权力来约束社会基层分子。正如聪明人在理智的控制下，克制自己心理上的冲动和口腹的贪欲一样，执政者们也同样地在社会中使其他阶级的人不致堕